

書評

朱冬芝*

羅麗馨

《十九世紀前的日韓關係與相互認識》

新北：華藝學術出版，2020年7月，662頁。

ISBN 9789864371785

一、前言

從華人視角論述東亞關係史的研究，至今仍是國內學界的主流。然而，東亞其他國家之間如何看待彼此？華人學界雖然長期關注這個問題，但對於「一衣帶水」的日韓關係，卻多只限於近代日韓的外交問題，¹又或是以中國的立場來論述，²關於日本或韓國視角的研究往往是透過翻譯或引用他國的著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Email: vertnuit@gmail.com。

¹ 除了韓國史、日本史等國別史論著，大多冠以日韓關係史的專著，如岩波書店出版木宮正史《日韓關係史》(2021)、趙景達《近代朝鮮と日本》(2012)等多是以十九世紀之後日韓關係為主。

² 早期研究日、韓關係史的著作，如周一良《明代援朝抗倭戰爭》(1962)、李光濤《朝鮮「壬辰倭禍」研究》(1972)、王儀《古代中韓關係與日本》(1973)、朱雲影《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1981)多是以中國為本位，論述中國的歷史如何影響日韓兩地。1980年代以後，除了因國別史研究涉入日韓關係如林明德《日本史》(1986)以外，多數研究仍舊關注於明清時期朝貢制度下的中日或中韓關係，如徐玉虎《明代琉球王國對外關係之研究》(1982)、鄭樑生《明、日關係史の研究》(1985)、李賢淑《明代中韓封貢貿易(1401-1591)》(1988)、葉泉宏《明代前期中韓國交之研究》(1991)，另外此時清史研究者，如陳捷先、莊吉發等已開始利用滿文檔案，針對朝鮮與清朝關係進行相關討論。2000年之後，兩岸研究仍多以探討近代中日或中韓關係為主，但加入燕行使、通信使記等日韓史料，試圖從日本或韓國，甚至是亞洲史的視角論述中國，如陳尚勝、葛兆光、裴英姬、吳政緯、程永超等。同時近年來，如甘懷真、葛兆光、廖肇亨、蔡振豐等學者則以不同的角度，如儒教、佛教或漢字等起源於中國的思想著手討論東亞各國關係，而非以單一國史或是中國王朝為出發點。

作，缺乏完整的中文論著。本書以流暢清晰的文筆，詳述日韓兩方如何建構起對彼此的認識，並分析中國從中扮演了何種角色，無疑為東亞關係史研究開啟了一扇新的窗口。跳脫以往以中國為中心的視野，整合中日韓三地的史料與研究成果，重新理解日韓之間的關係，正是羅麗馨教授《十九世紀前的日韓關係與相互認識》一書的重要性。

作者羅麗馨教授（1950-2020）為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榮譽特聘教授，曾任中興大學歷史系系主任，長年任職於中興大學，負責教授明清史與日本史相關課程。羅教授碩士畢業於東海大學歷史系，受業於呂士朋教授（1928-2023），著力於明代京營的研究。爾後遠渡海外，博士生階段師從川勝守教授（1940-2021），1990年以《明代官手工業の研究》一文取得日本國立九州大學博士學位，並以此為基礎，於1997年出版《十六・十七世紀手工業的生產發展》一書，啟發兩岸學界對中國近代手工業的認識。1998年之後，羅教授轉而關注於東亞關係史與日本史研究，³2001年開始陸續於中日韓各地學術會議與學報、研究期刊等，發表近二十篇相關論文。本書即是集結羅教授這二十年來的研究大成，以多篇曾發表於國內一級學術期刊的論文為基礎，加以重整、修訂出版。正因羅麗馨教授長年以來對於明清史研究的理解，以及留學九州大學、熟稔日本史料的背景，這本著作始能成為中文學界論述東亞關係史的重要指標。

二、本書簡介

除去前言與後記，本書分為三篇主題，共計十五章。第一篇分為五章，主題為「日本的朝鮮觀」。⁴作者說明自中世紀以來，日本如何形成蔑視朝鮮的觀

³ 見本書，〈後記〉，頁585-586。1998年以前，作者主要以明代社會經濟為主要研究範疇，但在此之後開始對日本史產生興趣。爾後2001年獲得日本交流協會獎助，於日本九州進行長達三個月的研究活動，並透過此時取得的資料，陸續於2002年之後開始撰寫相關論文，日後更不定期遠赴日、韓蒐集史料，最後於2015年開始著手整理研究成果，歷時五年集結成書。

⁴ 第一篇由四篇期刊論文組成，分別是第一章修改自〈日本人的朝鮮觀——神功皇后征三韓的傳說〉，《新史學》，18：3（2007），頁181-211。第二章修改自〈日本型華夷觀——七～九世紀日本的外交和禮儀〉，《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5（2006），頁49-114。第三章修改自〈元軍征日——日本的備戰與應戰〉，《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

點。時間始於神功皇后征三韓傳說（西元七世紀前後）的出現，橫跨近一千兩百年左右，直至十九世紀「征韓論」成形。第一章〈神功皇后征三韓的傳說〉，介紹日本西元七世紀初期《古事記》、《日本書紀》中，神功皇后征服新羅、高麗的傳說，說明該傳說的出現與內容，反映出此時日本已將朝鮮半島諸國視為前來朝貢的臣屬國，亦即將其視為可征討的地區。日後隨著不同時空的需要，神功皇后傳說一直是近代日本侵略韓國的依據。

第二章〈日本型華夷觀〉則指出日本在七世紀左右開始仿照唐朝的朝貢制度，要求朝鮮半島諸「蕃國」及日本列島內被列為「夷狄」的民族，必須向日本朝貢，⁵建立日本「東夷小帝國」體制。透過考察當時日本與三韓來往的國書與賓禮，可知日本曾試圖將三韓納入日本的小帝國體制中，但新羅並未遵從。到了八世紀，隨著唐朝的關注轉移至西北，並在百濟的拉攏之下，日本逐漸加深對朝鮮的控制，且逐一征討日本列島上的其他民族，將其內化成本國的行政區，擴張日本的領域。然而，到了西元九世紀，由於蝦夷等周邊民族轉而內屬於日本，加上朝鮮半島的三韓局勢漸穩，減少對日本依賴，導致日本原本建立的小帝國體制規模縮小，轉為形式化。與此同時，日本開始發展本土的「神國觀」、「領域觀念」，以此支撐民族優越感與日本中心主義。

十三世紀元軍征日失敗是促使日本神國觀成熟的關鍵。第三章〈元軍征日〉，說明元軍征日的緣起、過程與失敗的原因。受到華夷思想的影響，日本輕視中國以外的異族，即使是征服歐亞大陸的蒙古大軍也不例外。元軍征日的背景便是來自於日本朝廷不願回覆蒙古來書，引起元朝的憤怒所致。文永十一年（1274）與弘安四年（1281），元朝兩次進攻日本，卻因受阻於大風與颱風而敗退。儘管元軍的設備與人數遠遠優於日本，但由於內部混雜了各種族群，因此造成協調不易的問題。反之，九州武家軍團上下主從關係明確，加上有效利用石壘防衛與地利之便，不但比元軍來得主動，更迫使元軍屢屢屈

刊》，36（2004），頁 137-185。第四章修改自〈元軍征日——中世日本的對外觀〉，《興大人文學報》，35（2005），頁 611-658。第五章修改自〈十九世紀以前日本人的朝鮮觀〉，《臺大歷史學報》，38（2006），頁 159-218。

⁵ 關於列島上被視為夷狄的民族，如蝦夷等，亦有學者認為其並不需要向日本朝貢。林呈蓉，〈從歷史風土探討日本「國家意識」的建構〉，《臺灣國際研究季刊》，2：3（2006），頁 4。

居於劣勢。此外，由於日本朝廷在戰爭期間頻繁地實行祈神儀式，元軍敗退的結果也讓日本加深神國思想，認為自己是眾神守護的國度。

元軍的撤退，不但強化了日本的自信，同時也加深對鄰國朝鮮的輕視。第四章〈中世日本的對外觀〉論析元軍征日前後，日本的對外關係與神國思想的發展。原本就輕視元朝，將朝鮮半島視為臣屬地区的日本，因高麗國協助蒙古軍隊，而對繼任的朝鮮王朝產生敵意，將其地位降低如夷狄，甚至輕視為犬類。此時，日本的優越意識增強，除了自視為神聖之國，更開始認為自己是世界中央，異域皆應歸日本內化。順此脈絡，作者在第五章〈十九世紀以前日本的朝鮮觀〉總結以上各章內容，說明儘管十九世紀以前日韓民間不乏各種交流，但日本長期以來對於韓國始終保持著一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並視朝鮮為臣屬國。透過幾個面向可了解朝鮮如何被日本置於臣屬的地位，包括神功皇后的傳說、賓禮的位置、國書的稱謂，以及文人以穢地、三韓之夷、日本之犬稱呼朝鮮等，甚至在十七世紀日朝友好的時期，日本遞交給朝鮮的國書中不僅採用日本年號，也未以「國王」自稱。由此可知，當時日本並非基於明朝的冊封制度與朝鮮交往，而是將其置於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秩序底下。⁶

第二篇以四章組成，主題為「朝鮮的日本觀」，⁷利用目前華文學界較少注意到的朝鮮通信使紀錄，論述十四世紀至十八世紀朝鮮使節筆下的日本社會。相較第一篇以宏觀視角論述七至十九世紀的日本朝鮮觀，第二篇「朝鮮的日本觀」則著重於一些小人物的親身經歷與細微觀察，藉由朝鮮王朝（1392-

⁶ 有關當時日本對外國書不願採用「國王」，甚至以「大君」作為對外稱號，作者提供了日韓學者各種不同詮釋。田中健夫、吉野誠、荒野泰典等日本學者多認為大君一詞表現出對朝鮮的輕蔑，但韓國學者閔德基則以為這是因為足利將軍不敢潛越天皇自稱日本國王，因此採用「大君」一詞。見本書第五章，頁193-194。

⁷ 第二篇由四篇期刊論文組成，分別是第六章修改自〈朝鮮人所寫最早的日本紀行：宋希璟《老松堂日本行錄》〉，收入川勝博士記念論集刊行會編，《川勝守・賢亮博士古稀紀念：東方學論文集》（東京：汲古書院，2013），頁1009-1032。第七章修改自〈十五世紀朝鮮人對日本的觀察和記錄——以申叔舟《海東諸國記》為中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2（2009），頁81-119。第八章修改自〈江戶時代朝鮮通信使對日本社會的觀察〉，《臺大歷史學報》，41（2008），頁203-256。第九章修改自〈江戶時代朝鮮通信使對日本的觀察——以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為中心〉，收入於黃應貴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踐與社會的生產》（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頁135-196。

1897) 通信使對日本社會的描述與評價，呈現出此時朝鮮對日本的觀感。作者首先在第六章〈朝鮮最早的日本紀行〉中介紹韓國現存最早的日本行記，透過十四世紀的宋希璟(1376-1446)《老松堂日本行錄》的內容指出，朝鮮使節前往日本，必須躲避海賊與海浪的風險，而日本對朝鮮來使又不懷善意，說明當時通信使出使日本的艱困情況。即使如此，宋希璟廣泛地觀察日本社會，筆墨之間未有情緒性的批評。第七章〈十五世紀朝鮮人對日本的觀察〉介紹十五世紀因奉朝鮮成宗命令編纂的申叔舟(1417-1475)《海東諸國記》，分析當中收錄的〈日本國紀〉與〈朝聘應接紀〉。前者的內容反映出朝鮮王朝對日本的認識甚詳，包括歷代天皇、地理風俗等皆記載明確，而後者則詳細地記載日本各道向朝鮮遣使的情況，包括船隻規模、路線與朝鮮的接待制度。作者據其中內容加以整理，指出當時日本交通者來自各地，以西海道肥前州次數最多，當中多是為了貿易而來的商人或是倭寇，並且因為足利政權(1338-1573)底下各方多次遣使朝鮮，迫使朝鮮必須加以限制，改以對馬為主要的通口。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日本與朝鮮同受明朝冊封為國王，但在朝鮮的朝覲典禮上，這些日本來客被置於臣屬位置。

第八章〈江戶時代朝鮮通信使對日本社會的觀察〉與第九章〈江戶時代朝鮮通信使對日本自然和人文景觀的觀察〉則是依據十八世紀出版、收有二十種通信使紀錄的《海行摠載》，分析江戶時期朝鮮通信使如何評價日本的社會，記錄日本的地理環境。作者指出早期的通信使詳實如繪地記載日本地理景觀與風俗習慣；相較之下，江戶時期朝鮮通信使的記載則充滿各種日韓的比較，並站在中國儒教立場批判日本社會，例如嫌棄日本食物味道不如朝鮮、喪葬無舉哀之節猶如禽獸之域、歲時冷清似生計不豐，以及淫穢之風熾盛、全無羞愧之心等。正由於朝鮮王朝奉持慕華思想與華夷有別的觀念，在清朝建立之後形成「朝鮮小中華主義」，使得十六世紀之後的朝鮮將清朝、日本視為次等，輕視日本的心理油然而生。

本書最後一篇主題為「十六世紀末的朝鮮戰爭」，⁸共計六章，以十六世紀

⁸ 十六世紀日本共兩次出兵朝鮮，分別是文祿元年(1592)至二年(1593)、慶長二年(1597)至三年(1598)，其間日本一度長據朝鮮南部，直到豐臣秀吉過世。第三篇由六篇期刊論文組成，分別是第十章修改自〈豐臣秀吉侵略朝鮮〉，《國立政治大學歷史

豐臣秀吉(1537-1598)侵略朝鮮一役(日稱「文祿慶長之役」,韓稱「壬辰丁酉倭亂」)為重心,主要時間定於元祿元年至慶長三年(1592-1598)七年間,論述日本征討朝鮮的前因後果,以及戰爭中人民的生活情狀。其中可將第十至十二章視為一個小主題,說明日本出兵的原因、戰略政策與統治方針;第十三至十五章則是討論戰事之下各種人群的交流與生活樣貌,包括僧侶、傳教士、通事與俘虜等。

關於豐臣秀吉出兵征討朝鮮的原因各有取徑,第十章〈豐臣秀吉侵略朝鮮〉逐一解釋至今學者所提及的原因,並加以評解。⁹儘管許多研究指出此次日本征討朝鮮的原因之一在於消耗國內大名的軍力與領土分封的壓力,但作者指出背後更關鍵的因素,應是來自於征服大明的企圖。由於豐臣秀吉意圖使朝鮮成為征明的嚮導,但受到朝鮮的拒絕,因此引起日本的出征。在進入朝鮮半島之後,日本軍隊採取永久佔領與同化的方針,沿途不斷地築城,藉此開發朝鮮各地。第十一章〈日軍在朝鮮半島的築城〉聚焦於日本在朝鮮半島上建築的城池,並指出這些日本營建的朝鮮城池,雖然參照了日本工法,但許多設計皆是配合著朝鮮地形,進行調整,使之與日本有別。在日方建城的過程中,許多朝鮮百姓也逐漸被日本同化。透過朝鮮的「倭城」可知,當時日本不只是征討,更是打算長期治理朝鮮,讓朝鮮成為日軍攻打明朝的跳板或是前哨站。第十二章〈日軍的戰術〉透過日、朝兩國的設備優劣與攻守方式,進一步分析日本的戰術。作者認為雖然日本初期勢如破竹,也採取一些具有實效的戰略,但整體而言,朝鮮不僅有在地的優勢,後期更結合了明軍,

學報》,35(2011),頁33-74。第十一章修改自〈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期間日軍在朝鮮半島之築城——以日本史料為核心〉,《漢學研究》,30:4(2012),頁93-132。第十二章修改自〈萬曆朝鮮戰爭:日軍之戰術〉,《明代研究》,28(2017),頁65-88。第十三章修改自〈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日軍軍中的傳教士與僧侶〉,《漢學研究》,33:1(2015),頁163-198。第十四章修改自〈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日、朝、明三國軍中的疾疫、情蒐與通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47(2017),頁117-157。第十五章修改自〈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期間日軍在朝鮮半島的殺掠及朝鮮俘虜在日本的生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9(2013),頁93-143。

⁹ 日本出兵朝鮮的原因,作者彙整日本學者的研究指出有四:(1)想要恢復與明朝勘合貿易;(2)功名心(征服欲);(3)消耗大名的軍力或擴張領地分封大名;(4)以出征來安慰愛子病亡的打擊。然而,作者認為,由於日本兵力主要來自少數大名,且貿易對象不限於明朝等原因,故上述理由皆不夠完整。

得以參考明朝的戰略並取得新式鐵炮，整體優於日本軍隊。儘管這場戰爭的當事者是日本與朝鮮，但藉由之前的論述可知，日本出兵的原因與失敗的關鍵，皆肇因於中國的介入，而在日朝的和談過程中，明朝同樣扮演著重要的中介者角色。

第三篇的後三章〈日軍軍中的傳教士與僧侶〉、〈日、朝、明三國軍中的疾疫、情蒐與通訊〉、〈日軍在朝鮮半島的殺掠及朝鮮俘虜在日本的生活〉分別介紹軍人以外卻影響戰事與日朝關係的中介、跨界者。第十三章介紹日軍軍隊中的傳教士與僧侶，他們不僅透過各種宗教儀式穩定軍心、撫慰民心，也發揮醫療的作用。那些從鎌倉時期（1185-1333）就往來中日朝三地的禪僧們，更肩負起三地和談的溝通工作，除了代替軍隊草擬榜文，同時也安撫日軍統治下的朝鮮人民。而第十四章則以疾疫、情蒐與通訊三部分說明當時影響日方兵力、戰術與戰況的關鍵。透過《朝鮮實錄》、《日本戰史》等史料，說明當時日本、朝鮮與明朝三國皆受到疾病的侵擾；同時三國也同樣利用投降者，俘虜及通事來獲取對方的情報，甚至利用反間以取得有利的立場。在通訊方面，原有的海陸交通線上的港口、城池皆可作為傳遞訊息的驛站，不過各地通訊受到氣候與敵軍的干擾，導致傳送所需時間不定。舉例來說，從漢城移動到名護屋城快則十四天，慢則長達四十四天，冬季更可能需要七十至九十天之久，差距甚大，這也使得各地軍隊與統帥之間無法有效地聯繫應變，而讓戰爭結果產生變數。最後，本書的第十五章利用十七世紀初期的朝鮮使節紀錄，以及被擄去日本的姜沆（1567-1618）、鄭希得（1575-1640）日記，介紹日本俘虜朝鮮人的背景，描述這些俘虜在日本的生活面貌。儘管豐臣秀吉一再禁止軍隊掠殺朝鮮百姓，但從朝鮮的紀錄可知，日軍不僅焚掠民戶、斬首割鼻，更大肆俘虜朝鮮男女。大致來說，這些朝鮮俘虜分布在日本九州、四國等江戶以西地區，停戰之後仍有一些朝鮮人選擇留在日本，他們是將儒學、朝鮮的製陶與漢方醫藥知識帶入日本的重要人物，影響日後日本的學術發展。

三、主要觀點與延伸討論

誠如作者在前言所示，本書旨在瞭解（1）日韓兩國對立的歷史淵源，即

日、韓兩國長期失和的歷史背景，(2) 日本蔑視韓國的意識，(3) 韓國對日本的文化優越感，以及(4) 中國如何影響日韓關係等四點。但細觀各章內容可以發現本書並非僅僅探究日韓兩國的關係，更多內容是在說明十九世紀以前東北亞的局勢與日本中心主義的發展，同時從中發展出如築城、景觀觀察、通訊等新議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第一篇日本的朝鮮觀涉及中世紀之外，其他篇幅偏重於十三至十八世紀。因此書名雖是日韓並列，但從本書各篇所佔的比例來看，有關日本史或日本論著的比重遠較韓國來得多。

由於本書涉及的範圍十分泛博，受限於筆者的能力雖無法逐一精查，但受此書啟發，以下筆者將試圖提出幾點值得注意，或許是日後可以延伸討論的部分。

(一) 日韓相互輕蔑的歷史過程

首先是關於七至十六世紀日本的華夷思想與神國觀的發展，此面向也正是目前日韓或東亞史研究較少著墨的部分。若依循作者提出的內容，加以整理並延伸，可以發現以西元五世紀接收中國的華夷思想為首，¹⁰日本到了七世紀初出現神功皇后征服朝鮮的傳說，並建立起仿照中國的小帝國體制，利用三韓之間的糾紛趁機將勢力深化於朝鮮半島。但到了九世紀，隨著三韓局勢的穩定與日本境內夷狄的內屬，朝貢減少，日本遂轉而發展出境內的神國思想、領域觀念與優越感。其中神國思想更隨十三世紀元軍征日失敗而被強化，日本此後不僅將朝鮮視為臣屬，更當作不潔的穢地，以夷、犬稱之。在這種觀念下，結合神功皇后的傳說，豐臣秀吉不但於十六世紀中期出兵侵略朝鮮，更採取同化政策，試圖將朝鮮半島納入日本底下。由此可知，在十九世紀「征韓論」或亞洲主義等論述出現以前，日本的朝鮮觀經過一段長期的演變過程，而背後緊緊聯繫的正是日本的華夷思想、神國觀與神功皇后傳說，致使日本長期將韓國置於臣屬國的位置，並發展出以日本中心的東亞秩序構想。

¹⁰ 在此之前亦可注意到西元五世紀左右南宋一度批准日本倭王都督新羅、任那等地區的記載，日本因此獲得了中國對統轄朝鮮半島部分地區的承認。關於五世紀以前的日韓的交流情況可參考坂元義種，《古代東アジアの日本と朝鮮》（東京：吉川弘文館，1978）。

韓國也是一樣。本書雖未特地論及韓國的華夷思想，但若結合第一篇與第二篇的相關論述，也可以看出韓國的日本觀有其演變的過程。從西元十世紀的新羅停止對日朝貢開始，朝鮮半島的國家開始出現脫離日本附屬的想法。到了十三世紀以後，高麗王朝以朝鮮為中心發展出多元的天下觀。¹¹及至十五世紀初，透過接待日本使節的賓禮與國書稱謂可知，朝鮮將日本同視為臣屬明朝的國家，甚至比自己位階更低。十七世紀，朝鮮的小中華思想逐漸成熟，自認繼承明朝與朱子學的文化旗幟，是為小中華，遂又以此更進一步鄙視異族王朝的清朝，以及偏離明朝的日本。可說自十世紀到十六世紀，朝鮮不僅脫離了日本的控制，更在慕華與繼承大明旗幟的前提下產生輕日與獨立的心態，企圖經營以朝鮮為中心的秩序圈。

藉由日本與韓國彼此互爭高低的過程，本書清楚地展現中世紀以來日韓華夷思想的發展，進而凸顯出雙方認知上的差距。作者花了相當篇幅論述日韓的中心主義是在外在刺激與內在動力兩者互為關聯的情況下而發展，並非只是來自他者如中國或歐美的衝擊。但稍微可惜的是，對於九至十三世紀日本的朝鮮觀、十五世紀的己亥東征（又稱應永外寇）與之後朝鮮半島國家的覺醒等部分著墨略少。若能補足這段期間的相關事件，筆者認為將可能全面性地建構出一個關於日韓華夷秩序的歷史，更清楚日韓關係的演變。

（二）作為第三者的中國與東亞關係

除了理解日韓互相輕蔑彼此的歷史淵源與意識，本書另一個目的是思考中國在日韓關係演變的過程中扮演了何種角色。作為華夷思想的建構者，中國可說是中心，向日本與韓國傳遞天下秩序的觀念；同時中國亦是他者，成為日韓判斷彼此所佔位置的基準，並藉由不斷比較而產生主體意識。本書提及幾個重要的階段，包括從華夷思想的傳布、唐朝與新羅的合作，到元朝與高麗、明朝與朝鮮的聯軍，說明中國的介入無疑地影響日韓彼此的關係，而中國本身的局勢與動亂，如唐朝的勢力移轉、蒙元的人主與滿清的崛起，更

¹¹ 森平雅彥，〈高麗における自尊の表象——朝鮮の王朝はいかに自国を位置づけたか〉，收錄於吉澤誠一郎監修，《論点・東洋史学》（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2022），頁132-133。

導致遼東地區發生權力的空白，也促使長期慕華的日韓開始產生超越中國的意識。

中國對於日韓的影響，昭然可知。然而，換個角度來看，這種影響應非中國單方面、直線式的，在日韓意識到主體，乃至於出現超越中國的意識過程中，中國是否同樣也受到日韓的刺激？而位於中日韓之間的交通要樞，如遼東、琉球、對馬或是長崎，是如何進行傳遞的工作？這些議題隨著日韓相關研究的引介與史料的發現，深信都是可以再深入探討的部分。

由此延伸，若從整個東亞局勢的角度來看，影響日韓關係的關鍵也不應只有中國與兩國內部的變動，其他地區所帶來的蝴蝶效應也應加以考慮。以征韓戰爭而論，我們應當留意十六世紀後半各國使節頻繁往來所造成的禮儀衝突，¹²中國海禁政策造成日、朝海域經濟的競爭，以及暹羅、歐洲等其他勢力介入的影響。走私貿易底下的倭寇問題與白銀的流動，還有採取雙面姿態的中間國家，這些都令日本與朝鮮處於緊張的關係之下，而豐臣秀吉的出征行動正是在此一背景之下進行。如同鄭維中的研究所指，十六世紀日本出兵朝鮮，乃至打算征服中國，其背後原因來自東亞海域的龐大商機；日本已不願遵循中國主導的東亞秩序，而是打算自行建立對外貿易關係。¹³儘管日本型的華夷觀與長期以來神國思想，令他們產生輕視朝鮮或其他異族的想法，但十六世紀征朝戰爭則說明此時日本出兵朝鮮並非只是出自意識型態，日本顯然很早就意識到掌握東亞經濟的重要性。

（三）史料的運用與未來展望

在史料運用、解讀，以及二手研究的引用方面，本書採用大量日文史料、韓國通信使的漢文紀錄、文集，並對比日韓研究者彼此不同的論點，將這些

¹² 萬曆十五年至萬曆十七年（1587-1589）之間，朝鮮與日本的通信出現一連串禮節事件，亦可能是促使日本興兵朝鮮的主因。劉永連、謝祥偉，〈華夷秩序擴大化與朝鮮、日本之間相互認識的偏差——以庚寅朝鮮通信日本為例〉，《世界歷史》，2（2015），頁 60-68。

¹³ 鄭維中著，蔡耀緯譯，《海上傭兵：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新北：衛城出版社，2021），頁 38。

史料與使節紀錄鉅細靡遺地分類，加以統計、整理成表，¹⁴無疑嘉惠於學人。不過筆者認為在使用這些資料的同時，也必須注意史料的特殊性。以朝鮮通信使的資料來說，這些並非只是觀光遊記，而是帶有探查性的資料，呈獻的對象是朝鮮的統治階層。如同作者所指出，朝鮮使節對日本的觀察是有所選擇，並且帶有儒教立場，當中更不乏可見中日或朝日的比較，因而通信使錄呈現的是朝鮮人眼中的日本，而那些日本人如何地仰慕朝鮮使節的描述，也可能是通信使有意呈現的印象。同樣地，日本使節對中國或是朝鮮的描述也可能帶有某種意圖。因此在使用這些跨界者撰述的史料同時，研究者不但必須清楚作者的背景，也必須洞察作者行文背後的價值觀。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主題是論述日韓關係史這樣的大議題，作者卻十分留心於日韓關係底下的各種非官方交流，而這點應是東亞關係史研究值得留意的課題。戰事的頻起與使節往返，可以看到懷著不同目的的人群流動於中日韓之間。這些跨境者不但提供了豐富的紀錄，也讓我們得以發現戰爭與和平之下，軍人、文人與僧侶等如何超越國界，串起雙方的交流。猶如村井章介指出倭寇這類來自不同身份卻遊走於國境交界的「境界人」。¹⁵他們往往是在政治局勢不穩定的階段，如朝代更替或是交戰時期，超脫了國家的框架，形成各種集團；或是以外國人的身份在他國生活，或是超脫國界游離四方。這些人在歷史舞台扮演何種角色、有何重要性，可能是足以影響大歷史的關鍵。

自 1945 年以來，中、日、韓三國的關係可說一直保持著「微妙」的平衡，而過往日本的軍國主義、殖民地經濟等侵略行徑，更是牽引著中、韓兩地的民族情結。如果只是不斷地檢討十八、十九世紀的日本思想與侵略戰爭的關係，恐怕無法深刻地了解日本的侵略史觀，也無法了解朝鮮內部的發展。同樣地，若是一昧地沿用日本學者或是韓國學者的研究，將可能陷入雙方的史

¹⁴ 例如，作者整理西元七到八世紀間，新羅、渤海、蝦夷、隼人與元朝赴日的資料（第一篇），以及統計十四到十九世紀間，朝鮮使節的往來次數等與通信使資料（第二篇）等等。

¹⁵ marginal man，日文譯稱「マーヅナル・マン」或「境界人」。日本學者村井章介以此指涉十五世紀在東亞海域活動的倭寇、商人與俘虜等。村井章介，《（增補）中世日本の内と外》（東京：筑摩書房，2018），頁 190-193。

觀當中，而缺乏作為第三者的見解。要如何找出各個地區內部自身的發展動力，同時考慮到外在的影響，不再侷限於國史別或是戰爭史觀，轉而思考「跨國境」(transnational)的視角，以此理解東亞內部各國的異同，進而拼湊起東亞史、甚至是亞洲史的整體面貌，如同羅麗馨教授的嘗試與挑戰，將是值得重視的研究方向。

本文於 2023 年 4 月 1 日收稿；2023 年 6 月 21 日通過刊登

責任校對：黃文信